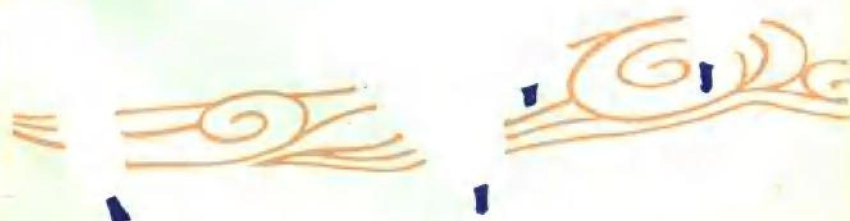


流透春雨的细桂

柏鸿鹤 杨昭



7.7



浇透春雨的缅桂(短篇小说集)

杨 昭
杨 昭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6.5
1978年12月第一版 197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500

统一书号: 10116·742

定价: 0.41元

内 容 提 要

这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小说十五篇。

作品中，有昔日的“琵琶鬼”，今日的合作社长和会计；有解放思想，冲破古规学犁田的两姊妹；有扎根民族地区，深受兄弟民族爱戴的汉族干部。小说塑造了一批敢于在思想上、生产上、生活上改变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学习新事物，创建新生活的令人喜爱的人物。此外，还塑造了“四人帮”横行时期敢于斗争的干部形象。

作品有边疆民族生活色彩，是一曲动人的民族新人新生活的颂歌。

目 录

浇透春雨的缅桂·····	(1)
还没有开始唱的歌·····	(21)
社长咪团和远房侄女·····	(35)
勐别姑娘·····	(57)
儿子·····	(75)
丢包·····	(93)
喜日·····	(104)
摩雅小赵·····	(112)
傣族两姊妹·····	(121)
最后一个·····	(137)
会见·····	(147)
高山头上一条龙·····	(154)
山海之间·····	(164)
新的粮食·····	(172)
一个拉祜族战士·····	(188)
后记·····	(204)

浇透春雨的缅桂

今年五月间，我随同一个剧团到边疆去深入生活，搞剧本创作。一天，我参观县委来公社巡回展出的“四人帮”及其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罪行展览回来，肚里有点饿了，便走进公社商店，想买点吃的。参观展览归来的人群，正熙熙攘攘的在买饼干。营业员是个女同志，约二十八、九岁左右，瓜子脸，高鼻梁，弯弯的眉毛下面，有一双水晶般清澈、明亮的眼睛。她穿一套普通干部服，能说一口流利的傣话，往后梳的发髻上，斜插着一把牙骨色的塑料梳子。一面收钱，一面售货，还同时在和好几位傣族妇女说说笑笑。那和蔼可亲的神态，给人一种朴素亲切的感觉。我以为她是傣族，转身去托一位会讲傣话的当地干部替我买饼干。那同志吃惊了，望着我问：“你不是来采访的吗？怎么不认识她？她就是颜静同志！”

我曾听人谈到过她在“四人帮”猖獗的时候进行的一些斗争，但详细情况不了解，忙走过去和她搭话，请她安排时间，把她的事迹详细给我唠唠。

晚上，同志们到剧场演出去了。我便静静地坐在宿舍里研究一路来采访到的材料，打算构思一下剧本。刚坐下，有

人从外面来到我的身边，我放下笔，抬头一看，呀！原来是颜静同志。她性格开朗，对我象久别重逢的老友般滔滔不绝地谈起来，简直不知时光在流淌。直到演出的同志归来了，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她站起来，约我到她的宿舍里去。我跟随她走过两个拐角，一阵芳香扑来，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连心也仿佛喝了葡萄酒似的甜蜜。她开亮走廊上的电灯，这才使我看清了，原来她门口有两株郁郁葱葱正在成长的缅桂树，缅桂花在青黝黝的绿叶中吸吮着夜露，喷吐芳香。进入屋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抱大小不一，新旧各异、颜色不等的日记本，递给我说：“给，我唠叨了半日，也没说清楚。这是那些时候的日记，你自己看吧。”我随手翻了几页，立刻被她那真挚的感情和顽强的意志震撼住了。我想把她的事迹公诸于世，作为批判“四人帮”的一道檄文！我问她是否可以给我抄上几页，拿去发表。她说只要对我的写作有用，她那在火热的斗争中用泪水写下的日记，就算是派上了最好的用场。我掏出笔，正要抄，她索性“刷刷刷”地撕下递给我，说：“你不必抄了，拿去作参考吧。”一面说，一面解释道：“这是两部份。你先了解一下我学生时代的思想状况吧。你看我当中学生时候，简直象是白纸一张，无知、幼稚。举行毕业典礼那一天，我象一个刚学迈步的小孩，兴致勃勃的望着展现在面前的长长的道路，多想一步跨过去，早一点领略自己生命中还从来没有展现过的新颖而又神奇的生活！那知，生活的道路，原来充满着艰苦曲折的斗争！”

下面，是她给我的日记中的第一部份：

1965年6月30日 毕业了，我领到财经学校的毕业证

书。我左看右看，总也看不够。证书上面刻印的簇簇鲜花，在我眼前化为轻柔的彩云，载着我走遍了我所能想象的世界。无论我将来分配到什么地方，担任什么工作，那都是花团锦簇，说不尽的开怀和痛快啊！只是在新的美好的生活里，我能否象中学生一样取得满分呢？……

1965年8月30日 我接到工作分配的通知书。分配到边疆地区的县商业局做统计工作。可以肯定，各条战线的统计数字，都是直线上升的，但愿我的进步，也将象各条战线一样，是直线上升的。

1965年9月2日 昨天大家都还叫我小颜小颜，今天县商业局局长余远接见我时，竟叫我颜静同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生怕有愧于这个崇高而尊严的同志称号。余远同志沉着而深邃地对我说：“你休息两天，先到县供销社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风雨，见世面，怎么样？”我第一次离开父母、老师，来到一个直接领导我工作的人面前，尽管他也是个年青干部，比我大几岁，说话又和蔼可亲，可我还是十分紧张和侷促。我坐在条凳上，一只手搭在旁边的行李卷上，十个指头下意识地捻动着捆行李的绳结，口里呢呢喃喃地说：“我今天是坐车来，我今天一点不累，我今天就可以去报到，我今天……”我发觉自己“今天今天”的，连忙打住话头说：“县供销社在那里？我现在就去报到。”

颜静见我看完了日记的第一部份，轻轻地喟叹一声，说：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对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

曲折性还一无所知。到了1969年几乎竟因此而丧失了生命。使我开始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可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明知担当风险，我也挺身而出，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她说到这里，略一停顿，说：

“今天你参观过县委举办的展览，全县的那个帮派头目钱开欣当时是县供销社的一个营业员，他利用下乡收购药材的机会，竟压低等级，少付给景颇族、傣族社员人民币四千多元，同时，又提高等级，攫取了国家的收购费用二千多元，此外，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四千多元，赌博酗酒，生活腐化。我把从各方面听来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根据大量确凿事实，写了个揭发材料，交由县供销社主任老常同志转县人民政府。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钱开欣混入群众组织，并篡夺了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权。1968年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时，他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进入县革委，成了县革委副主任。我认为这种人决不是什么“革命造反派”，不能掌无产阶级的大权，我把他过去贪污的情况，加上他新的种种恶劣表现，整理成一份揭发材料，送给刚成立不久的县革委核心小组。就这样，我们早已拉开了序幕的那场斗争，比过去更加尖锐复杂地开展起来了。详细经过情况，还是请你看日记吧！”

下面，是她的日记的第二部份：

1969年2月8日 钱开欣派人来通知我，叫我到县革委会去谈话。从来人那嚣张的语气和狰狞的表情看，我明白是一台什么事了。到了县革委，钱开欣把我叫到一间办公室里，他大咧咧地坐着，从衣袋里掏出我写的那份揭发材料向

我一亮说：“瞧，告到我手里来了。”

我真不明白，党的组织原则怎么会被他们践踏到这般地步！我心里感到无比地愤慨和不平。他见我咬紧的嘴唇都冒出血来，狞笑着说道：

“我们是可以和解的，为什么要把弦绷得那么紧呢？我不计较过去的事，我是领导人嘛，何况那些事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你的工作我会作适当的安排。不过，一、你要写一个声明，说这是余远唆使你写的，是诬告；二、揭发余远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罪行。”

我气愤极了，忿忿地说：

“你想用刀尖上的蜜，诱使我用我的牙齿咬自己的舌头，血口喷陷革命干部，作为你长期钻进红色政权，危害革命、危害人民、搞复辟的资本？不，办不到，绝对办不到。我不害怕你打击陷害，我写它，就是为了揭发你。总有一天，党会出来伸张正义的。余远两年前就被你们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漏网的四清下台干部’，把他关押起来了，他又怎么唆使我呢？”

“这些话，不用核对，一听就知是余远的腔调！如果你拒绝写声明，拒绝揭发余远，那么，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红色政权是什么性质，你不会不明白吧？”

“明白，我全明白。正是为了保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保护文化大革命，保护红色政权，我才写那份检举揭发材料的。”

“盛开的花越摆动，就会引来更多的黄蜂；鲜红的果子不落地，就会被乌鸦啄了吃。你引起的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

“山上没有散不尽的云雾，屋里没有散不尽的炊烟，短索子结不了长扣，我等着瞧！”

就这样，我们在怒目而视中结束了这场谈话。

1969年2月11日 钱开欣召开批判余远的大会，勒令县级机关全体干部都参加。大会刚开始，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

“把颜静揪出来，颜静是走资派余远的黑干将！”

有人应声来拖我。我在心里勉励自己：“山野的笋苗最坚韧，哪怕狂风吹袭，还是要蓬蓬勃勃长成林。”我象羊一样用脚抵着地，用手掀开他们，可是四五个彪形大汉还是把我死拉活拽地拉上了台口。他们按住我的身子，用脚踢我的膝盖后面，强迫我下跪。我几次被他们掀倒了，可我竭尽全力昂然站立起来！会场里有人再也容忍不下去了，纷纷叫道：

“人家一个群众，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这样对待她？”

钱开欣听到群众的怒吼，眼看他导演的丑剧要被揭穿了，他立刻从主席台上走到我面前，心怀叵测地说：

“你看你，还顽固哩！告诉你，群众对你义愤很大，要不是我做了工作，看人家不把你打死！”

钱开欣的这一提示，立刻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那几个死心塌地跟随他的人，强迫我下跪，“刷刷刷”打了我几个耳光，把我的鼻子、牙齿都打出血来。我狠狠地望住钱开欣，使出我最大的气力当众揭发说：

“在钱开欣进入县革委的时候，我给县革委核心小组写过一份材料，揭发他在县供销社时候贪污、舞弊、侵吞国家财产一万多元。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资产阶级派性，把负责干部一个个打成走资派。三天前他找我去谈话，他叫我……”

本来乱纷纷的会场，这时连谁轻轻咳一声都象打雷一般响。钱开欣慌了手脚，当胸一拳把我打倒，一脚踢朝我的心窝，我在群众的一片抗议声中，口吐鲜血，人事不省，晕了过去。……”

看到这里，日记中断了。我见有张扉页，插在两页日记之间。颜静在一旁插话说：

“下面的日记是我事后补记的。因为当时我被打伤，已无能力提笔了。记忆也不健全。只不过在我被打伤打残的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好同志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与他们进行斗争啊！为了把他们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记下来，为了学习他们在狂风暴雨下不低头的彻底革命精神，为了激励自己不断前进，我后来作了补记。”

果然，翻过扉页，我又看见她补记的那几则日记了：

1969年2月14日 三天来，我不住地咯血，滴水未进。我想坐一会儿，但身子挪不动，真象有千斤重一般。胸部，时时象被千刀万剐般地痛楚，头，简直象有许许多多尖利的锥子在乱扎。

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走过，有人用白纸裹住一个石子抛到床铺上。我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坚持斗争，就是胜利”。落款是余远。不一会，钱开欣站在门口，用那一连重复了好

几天的问话暴躁而凶狠地问道：

“吃饭吗？”

“不吃。”

“想死？”

“不。”

按照惯例，钱开欣应该走了。但今天却打破常规，他向门外招呼道：

“来，把她押到卫生所看看，她究竟装什么病？”回头对我：“颜静，别以为这样一来群众就会同情你，你抗拒群众的批判，决没有好下场。”

我无力说话，只用愤怒的目光横扫了他一眼。

这时，从屋外走进一男一女来。他们瞅一眼床单上和地上殷红的鲜血，不耐烦地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命令我走。我被这一拖，双眼发黑，两腿簌簌晃动，一跤跌倒地下了。他们一把将我抓起来，连推带搽地说：

“嗨，还娇滴滴的？”女的嘟嘟囔囔地抱怨说：“钱副主任，你也太群众路线了，谁说不该揍她，应该给她治病，那就让谁来服侍她吧。”

钱开欣脸上布满了横肉，杀气腾腾地说：“叫她自己走。”

我扶住墙壁，喘着粗气，使出浑身力气使自己站住。我确实需要看病了。

那个女的见我实在迈不开脚步，又嫌搀扶我麻烦，对钱开欣说：

“是不是派张车子拉她？”

“她是重点审查对象，她不配！”

我由那两人扶住胳膊，身不由己地老倾向一侧。他们打我，喝斥我，象拖木头似的拖我走。我一口一口地、接二连三地吐出鲜血，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卫生所先是由两个医生对我进行检查，她们一按我的脉搏，立即唤来了另外几个医生。到了最后，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来会诊了。他们对送我去的人说道：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病情这样严重。立刻送县医院抢救。”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知道。开批判大会那天，我们正要弄清楚是她揭发批判钱开欣，还是钱开欣揭发批判她。钱开欣就动手打人。怎么不知道！”

“你们知道钱副主任是什么脾气吗？”

“管他什么脾气，‘救死扶伤’，是毛主席的教导。你们把她送来医院，就是我们的人了。立刻抢救。”

那一男一女似乎骂了句“老保医院”，打电话汇报去了。一会儿，来了一辆马车把我送到县医院，而且不准我带走卫生所的病情诊断书。到了县医院，医生不等全部检查完毕，立刻说：

“病人今晚住院急救，明天你们赶快弄汽车来送省医院。如果不动手术，生命十分危险。”

“她罪孽深重，民愤很大，正在审查。”

“这些自有党来作结论。你们把她送来给我们治，就得

听我们的。不送，出了人命，你们负责？”

我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我听得很清楚。我在心里暗暗想：“不管钱开欣如何想一手遮天，但到处都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我的心越发亮堂了。我不但没有想到会死，而且相信我会活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县闪耀出灿烂光辉的那一天。

1969年2月20日 昨天我抵达省城医院。今天早晨检查病房时，主治医生拿着我拍的片子，对其他医生说：“怎么搞的，肺部有点看不清楚！”别的医生都惊讶地围拢去，细细瞧，瞧了一会，都说看不清楚。他们回过头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挨了当胸一拳，又挨了窝心一脚！”“什么时候打的？”“我只记得那天是二月十一日。医生，今天几号了？”“好顽强的生命力！”医生声嗓微微有点嘶哑，叹息了一声，说“姑娘，你安心住院吧。”我说：“医生，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参加工作不到四年的学生，我没错，我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医生深情地望了我一眼，又对我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他们小声交换了意见，安慰我几句，走了。

1969年2月24日 清晨，检查病房时候，主治医生对我说：“姑娘，你的肋骨被打断了，折断的肋骨刺入肺部，肺出血，被瘀血裹住了，所以拍片不很清楚。现在要动手术。我们打长途电话征求你们单位的意见，他们说动是要动的，但这种手术太危险，怕你不会同意。问你是不是回去算了，以后他们安排一点轻松的工作给你”。我一听，就知道是钱开欣假装慈悲，妄想使我不治而回，二天不但可以整

我，还可以强加给我一个：欺骗组织，谎报病情的罪名。想到县卫生所县医院的同志，是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才能来省城医治；想到余远的纸条，我想：这决不是个个人的问题，事关路线！我一定要配合省医院把病治好，好继续和钱开欣斗。我说：“请你们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吧！我相信你们，我不怕。”

1969年3月19日 手术已做过二十五天了，还没下床。今天由一个护士同志搀扶着我，教我走路。我看着病床边那不长的但是坚实而平坦的路，中学毕业时候那富于幻想的年青人的心又强烈地跳动了。我用力迈出了第一步，心里想：尽管前进的道路多么曲折，我还是要勇敢而坚定地走下去。

1969年6月19日 今天午睡醒来，忽然看到了余远同志。他身着一套蓝色工作服，安静地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还是和以往那样象森林一样深沉，高山一样坚定，崖石一样刚毅，只是面颊显得清瘦了一点。他说：“你总算医好了。”我说：“你现在？……”我本想问他恢复了工作没有？一想钱开欣那容他出来工作，便迟迟不好开口。他看出我的心思，说：“他们把你关起来后，又斗了我几台，便强迫我下放工厂监督劳动。我现在在煤矿当工人，你也调到煤矿小卖部当营业员。煤矿党支部书记老王，是个好同志，是他派我来接你的。开初他对接受一个病人来煤矿工作有点担心，怕工人买不到东西。经我一介绍，他就派我来接你了。”我笑了笑，说：“我连二十三岁都不到，就是二十四小时站柜台，我也支撑得住。”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候，余远同志经常到供销社听汇报，作布置；后来又一道与钱开欣展开过

斗争。在那火热的斗争中，我们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接触，他对我是了解的，可他听了我的话，并未象以往一样给我鼓励，只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我以为他长途跋涉疲累了，便请他去休息。他走后，我去住院部办公室找到主治医生，我兴冲冲地说：“医生，我有工作了。我们单位派人来接我，他们不晓得我的治疗情况，还怕我不能坚持工作，你给他介绍介绍吧！”医生久久地望住我，机械地说：“我们给你出个证明，叫你们的单位尽量照顾你的身体。”我从没想到要照顾，吃惊地问：“为什么要照顾？”“你是脑震荡后，又动了手术，而这种手术，这种手术……”他动了感情，没说下去。我恐惧地望住她，心想：“莫非我已丧失工作能力了？！……”泪珠一下挂满腮边，绝望和希望交织在一起，我哀痛地问：“难道我……”医生不摇头，也不点头，顿时，我忍不住哭出声来，我怕惊扰了别的病人，忙咬住牙，竭力克制自己，一阵激烈的抽噎过后，我问：“我还能活几年？”“象你这种情况，还少有过。……颜静，身残志不残，你，注意身体，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我想站起身来，那经常影响我思索并使我痛苦难当的头痛症又剧烈发作了，我扶住椅子，双手不住簌簌地在颤抖，目光迟滞，神情恍惚，好一会才平静下来。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病房，吃了一包头痛粉，提起笔，在头痛粉的封套上写“身残志不残”，“身残志不残”。我一刻也不会忘记，我是一只学飞的小鸟，我要在暴风雨中练翅膀，迎着太阳学高飞。

1969年6月23日 长长的四天车路，已走完了，再步行几里地，就到煤矿了。我们下车后，余远用竹子扁担套上行

李，准备上路。他瞄着行李卷，踌躇了一会，说：“小颜，你的病，不知医生告诉了你没有？你需要人照顾，你的父母又不在这里，你看，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从没见过他口吃过！就是钱开欣批斗他的时候，他也能针锋相对，应答如流。我以为他替我为难，我说：“年青青的，何消照顾，走。”他横抬着竹子扁担，没把行李卷抬起来，双眼凝视着我，很为难地说道：“你瞧，我又没有家。”我微笑了，以为他抱歉不能照料我。他不理会我，又口吃起来了：

“你瞧，是不是，是不是？……”我看着他那不自然的様子，我心里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我避开他的深情的目光，痛苦地说：“我活不长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要求工作，工作，走吧。”我尽力迈大步子，朝前走。一路上，我们再没说一句话。……

1969年7月31日 我正式接替了小卖部的工作。原来的营业员今天到县城去住院生孩子。小卖部的营业时间本来是上午八时到下午六时。我怕工人上早班前、下晚班后买不到东西，主动改为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煤矿党支部书记老王来买火柴，见我把营业时间放长了，亲切地朝我笑笑，说：

“小颜，你没有来之前，我还说，还说……”我明白他要说什么，接口说：“我要是你，也要那样考虑的。你看，煤矿工人多辛苦，整天挥汗如雨，干劲冲天，勤勤恳恳，那能让他们买不到东西？”他高兴地望了我一眼，满意地走了。我望着走出去了的支书的宽厚的背脊，想起余远在路上向我介绍的情况：“老王，一天从早忙到晚，对人亲切，又讲原则。”我想：要我也象他那样就好了。我工作还很不够，我的锻炼